

孙中山的三大政策与新三民主义的内在联系

吴 剑 杰

孙中山晚年亲自确立和执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是确定不移的历史事实。需要深入研究的,不是寻章摘句去钩稽孙中山是否使用过“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以及“三大政策”这类词语的概念,而是他何以会在晚年确立和执行三大政策的思想认识根源以及三大政策与重新解释三民主义之间的关系。孙中山认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与他所主张的民生主义有着许多共同点和相似点,认定“共产主义是民生主义的好朋友”,是他确立和执行三大政策的思想根源和理论依据,是其旧三民主义在新时代条件下合乎逻辑的发展,决不是什么“临时权宜之计”。孙中山重新解释三民主义是为着适应三大政策的需要,同时也为三大政策的实施提供了思想理论上的依据;三大政策是新三民主义的核心,是新三民主义在当时历史阶段的最重要的政策体现。从某种意义上说,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与新的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有着对应关系,密不可分,决不是“三件个别的事实”。

在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人的推动和协助下,由孙中山主持召开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所取得的两项重要成果,一是对三民主义的重新解释,一是正式确立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实现第一次国共间的合作。

关于三大政策,即“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作为一个规范的完整的概念的提出,确非出自孙中山本人,而是由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在与国民党右派的斗争中逐渐明确和完成的。1925年12月,针对孙中山逝世后西山会议派的反苏反共叫嚣,国民党中央于4日和11日先后发表《对全国及海外全体党员解释革命策略之通告》和《召集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对孙中山生前所确定和执行的革命政策进行阐释,指出:“联俄与容纳共产派分子,则为本党求达革命成功之重要政策”,先总理决之于先,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采纳于后,并将孙中山在“一大”确定的“根本方策”归纳为五条,其中第一条为“明揭反对帝国主义之主张,同时更与世界革命先进之苏俄联合战线”,第二条为“结合农工民众之势力”,第四条为“容

纳中国共产党党员,与之努力于国民革命之工作”^①。显然,这些提法已经包含了三大政策的内容。1926年3月,中共中央为孙中山逝世一周年发表告国民党党员书,提出国民党中的右派所反对的“国民党联共联俄,本是中山先生在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时所决定的革命政策”^②,这里首次概括出“联共、联俄”两大革命政策。同年10月3日,吴善珍、余洒度在该日编印的《黄埔潮》上分别发表《我们对总理的联俄联共政策怀疑吗?》和《黄埔同学会目前重要的工作》两文,内中有:“我们知道总理决定‘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以后……”和“总理对革命的三大政策:A联俄……,B联共……,C拥护农工利益……”的提法^③。这虽是第一次完整地概括出“三大政策”的用语,但因为《黄埔潮》只是黄埔军校同学会编印的一种内部刊物,文章作者大概只是普通学员,估计影响力不大,还不能说是“三大政策”一词的正式公开地提出。同年11月4日,中共总书记陈独秀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作《关于国民党问题》的报告时,认为国民党中肯定存在与中共合作的左派,而左派的纲领就是“继续总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④。同年7月,担任中共广东区委宣传部长的任卓宣在区委机关报《人民周刊》发表《我们对于十月革命应有的认识》一文,指出近几年国民革命的发展都是“孙中山联俄、联共及农工三大政策之结果”^⑤。不久,在汉口召开的中共中央特别会议的决议中,正式使用了“三大政策”的提法。至此,以“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为内容的“三大政策”已成为中共领导层的共识并开始公开使用。此后,即在全国特别是在作为当时革命中心的武汉,掀起了宣传“三大政策”的热潮,并逐渐为包括许多国民党领导人在内的各界人士和广大群众所认同与接受。

无庸讳言,所谓“三大政策”的概念确实是主要经过中国共产党人的归纳、提炼而约定俗成的。据此,便有人否认孙中山曾有过三大政策,而断言三大政策是共产党“越俎代庖”,替国民党“想出来的”,甚至说它是“鲍罗廷假借孙中山的名义提出的”。从当年的国民党要员顾孟余到今天台湾和国外某些学者都作如是说^⑥,并且对三大政策中的“联共”政策尤为反感。持有上述观点的人的出发点也许并不一致,其中有的是为了给自己的背叛孙中山、坚持反共立场寻找“根据”,有的则偏重于从学理上探讨“三大政策”这一概念的真实性与准确性。对于前一种人,我们无法与他理论,因为任何客观事实都无法改变其反共立场。对于后一种人的意见,已引起大陆学者的重视,并且做了认真的研究,通过对国民党“一大”前后孙中山的言论、实践的科学分析,坚持认为“说孙中山在‘一大’上确定了这三项政策,应是符合实际的。虽然他本人并未采用‘三大政策’的概念进行归纳,但这三项政策的存在乃是当时一个重要的客观事实,由后人加以概括还是容许的。”^⑦日本学者狭间直树通过对当时国共两党关系的变化和“三大政策”这一概括产生的基本历史线索的考察,也得出结论说:“既然‘三大政策’中的每一条都是根据孙文革命政策的内容及国民革命发展变化的历史趋势而总结出来的,所以我们不能同意顾孟余所说的‘三大政策……是共产党的越俎代庖’,是同孙文思想无缘的”^⑧。其实,孙中山“三大政策”的核心是“联俄”,因为要联合信奉共产主义的苏维埃俄国,自然也要联合同样信仰共产主义并且最能代表工农利益的中国共产党;要支持工农运动,自然必然保护工农利益。硬说“三大政策”与孙中山无关的人却极力回避这个核心问题,偏在“联共”问题上作文章,是因为孙中山生前不仅有“数年前予曾有联俄主张”的明确用语^⑨,而且有聘用苏俄顾问,接受苏俄军事、财政援助的事实,甚至在他弥留之际还不忘叮嘱国民党继续与苏俄“合力共作”、“携手并进”。至于“联共”一词,孙中山生前确未使用

过，不仅如此，就连“容共”这样的词也没有用过。但是，在“一大”改组国民党前后，为了消除国民党内某些人因共产党员的加入会使国民党“赤化”、“共产化”的疑虑，他多次强调过必须与共产党人合作进行国民革命的必要性，其中下面一段话尤为重要：

顾有好造谣生事者，谓本党改组后，已变为共产党。此种谰言，非出诸敌人破坏之行为，即属于毫无意识之疑虑……

至于社会主义青年团之加入本党，在前年陈炯明叛变，本党经一度顿挫后，彼等认为共同革命，非有极大之结合，事不克举，故欣然同趋一致，以期有益于革命之实行。本总理受之在前，党人即不应议之于后。来者不拒，所以昭吾党之量能容物，而开将来继续奋斗之长途。吾党之新机于是乎在。彼此既志同道合，则团体以内无新旧分子之别。在党言党，唯有视能否为本党、为主义负责奋斗而定其优劣耳^⑧。

孙中山的这段话，已经明白不过地表达了他坚持容纳或联合共产党（包括社会主义青年团）人“共同革命”的思想主张，任何不抱政治偏见的人都不会认为将上述思想主张概括为“联共”政策是违背了孙中山的本意。

笔者认为，孙中山晚年亲自确立和执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是确定不移的历史事实。需要深入研究的，不是寻章摘句地去钩稽孙中山是否使用过“联俄”、“联共”、“扶助农工”这类词语概念，而是他何以会在晚年确立和实行这三大政策的思想认识根源以及三大政策与重新解释三民主义之间的关系。

一、关于孙中山“三大政策”的思想认识根源

前文已述，孙中山“三大政策”的核心是“联俄”，即联合社会主义的苏维埃俄国。为什么主张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孙中山会决定联俄？当然，首先是20年代前后国内外形势的变化发展所促成，但从根本上讲，是他的思想深处认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与他所主张的民生主义有着许多共同点和相似点，产生共鸣。

我们知道，早在上一个世纪末，孙中山第一次游历欧美期间便开始注意和研究当时正在兴起的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各种社会主义学说，并作为构筑民生主义的思想营养。1905年5月，他在比利时造访第二国际社会党执行局，向该局主席王德威尔德、书记胡斯曼扼要地解释自己的社会主义观点，并要求加入国际。他的主要观点是：“采用欧洲的生产方式，使用机器但要避免其种种弊端”；“要在将来建立一个没有任何过渡的新社会”，使“中世纪的生产方式将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生产阶段，而工人不必经受被资本家剥削的痛苦”^⑨，等等。以后，他多次说过他的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甚至宣称“余实完全社会主义家也”^⑩。其实，孙中山始终不是一个真正的社会主义者，也不理解和接受科学社会主义，因为他不赞成唯物史观、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也不赞成作为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基石的剩余价值学说；他不赞同实现真正社会主义、到达共产主义的手段，但赞赏和向往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所要达到的目的，并自认为这个目的与他的民生主义所追求的目标相一致，因而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始终抱着友好的态度。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体系建立起社会主义性质的新型国家，这就更增强了孙中山对社会主义的向往。此后，特别是“一大”改组国民党前后，为了从思想理论上说明联合俄国及容纳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实行党内合作

的必要性与正确性,他多次论及民生主义与共产主义的关系,比较其异同。如在“一大”期间,当宣言审查委员会对“民生主义”部分发生争论时,孙中山向大会专门作了关于民生问题的演说,指出民生主义是“本党之基础”,但“本党多数同志对此重要主义,向不甚留心研究,故近日因此主义而生误会,因误会而生怀疑,因怀疑而生暗潮”。孙中山这里所指的“误会”是指认为“‘民生’与‘共产’为绝对不同之二种主义”,误解了民生主义的真谛。于是,他在讲演时画出四个大小不等的圆圈表示几种主义之间的关系:外圈的大圆表示“民生主义”,内中的中圆表示“社会主义”,中圆内并列两个小圆表示“共产主义”和“集体主义”,以此说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都包括在他的民生主义之中,“本党同志于此便可十分了解共产主义与民生主义毫无冲突,不过范围有大小耳”^⑨。在后来作民生主义的系统讲演时,孙中山又多次论及共产主义与民生主义:

……共产主义就是最高的理想来解决社会问题的。我们国民党所提倡的民生主义,不但是最高的理想,并且是社会的原动力,是一切历史活动的重心。……我今天来分别共产主义和民生主义,可以说共产主义是民生的理想,民生主义是共产主义的实行,所以两种主义没有什么分别,要分别的还是在方法^⑩。

为什么我敢说我们革命同志对民生主义还没有明白呢?就是由于这次国民党改组,许多同志因为反对共产党,便居然说共产主义和三民主义不同,在中国只要实行三民主义便够了,共产主义是决不能容纳的。……民生主义究竟是什么东西呢?民生主义就是共产主义,就是社会主义。所以我们对于共产主义,不但不能说是和民生主义相冲突,并且是一个好朋友,主张民生主义的人应该要细心去研究的^⑪。

平心而论,孙中山的上述观点,包含着对共产主义的诸多误解。其中最大的误解,是不理解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学说是一种包括唯物史观、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三个组成部分的完整的科学思想体系,而把它仅仅理解为解决人们的吃饭、穿衣问题的某种经济理论。但正是从这里,他发现了共产主义与他的“以养民为目的”的民生主义的契合点,从而认定“共产主义是民生主义的好朋友”。孙中山是一个光明磊落、襟怀坦白的人,从不隐瞒自己的政治立场和观点。他在尊崇马克思是“集几千年来人类思想的大成”的社会主义的“圣人”的同时,又对马克思关于物质生产方式的变革是社会历史发展的重心和阶级斗争、剩余价值等理论进行逐一批评,明确表示“虽然是很崇拜马克思的学问,但是不能用马克思的办法到中国来实行。”^⑫他多次说到革命的俄国是中国的“好榜样”、“好模范”,但同时又表示他“从未想及变中国为一共产主义国家”^⑬,甚至当着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的面,也直言不讳地表示他对共产主义政治制度的怀疑:“我给你一个山区,一个最荒凉的没有被现代文明所教化的县。那里住着苗族人。他们比我们的城里人更能接受共产主义。……你们就在这个县里组织苏维埃政权吧,如果你们的经验是成功的,那么我一定在全国实行这个制度。”^⑭然而,孙中山并不因为世界观和价值取向的歧异而敌视马克思和他的共产主义学说,而是以一个伟大政治家的宽怀大度和远见卓识,努力求同而存异,尊敬和钦佩马克思的学说和列宁的事业,学习和借鉴俄国革命的经验,欢迎共产国际的帮助。这些正是孙中山的可敬可贵之处,是他高出他的许多同代人的所在。也正是基于以上认识,他理解和欣赏年青的中国共产党人在中国开展共产主义的宣传活动和他们的献身精神。他说:“到底赞成马克思主义的那般青年志士,用心是什么样呢?他们的用心是很好的。他们主张要从根本上解决,以为政治、社会问题要正本清源,

非从根本上解决不可。所以他们便极力组织共产党，在中国来活动。”^⑩他称赞李大钊这样的共产党人是“真正的革命同志”，劝告国民党员要“以共产党人为榜样，像共产党人一样为革命辛勤工作，不怕牺牲”^⑪。

如上所述，孙中山关于“共产主义是民生主义的好朋友”的论断是他确立和执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认识根源和理论基石。这是他晚年顺乎历史潮流、适应时代需要的巨大进步；也是他投身革命即抱定的“拯救同群”宗旨的合乎逻辑的发展。那种认为孙中山采取联俄、联共政策是所谓“临时权宜之计”的论点是没有任何根据的。正因为三大政策是建立在上述思想认识基础之上，因而决不容许任何诋毁和破坏三大政策的行为。“一大”闭幕不久，他曾当面申斥冯自由等顽固坚持反共立场的国民党要人：“反对中国共产党即是反对共产主义，反对共产主义即是反对本党之民生主义，便即是破坏纪律，照党章应当革除党籍及枪毙。”^⑫冯自由等人被迫作了书面检讨，所以既未开除，更没有枪毙，但孙中山的愤怒之情溢于言表，他告诫全党：“以后不得再起暗潮，如有怀疑，当来直问总理为是。”^⑬

二、关于三大政策与新三民主义的关系

孙中山重新解释的三民主义，或曰新三民主义，是他在20世纪初年创立的三民主义在20年代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继续和发展，是他用以指导新时期国民革命的思想理论体系，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则是依据和体现这一思想理论体系所确定的重要政策原则，因此二者有密不可分内在联系。在一定意义上说，新三民主义之所以谓之“新”，关键在于它包括着三大政策，任何贬低三大政策对于新三民主义的重要性的论点都是难以令人信服的。

首先，孙中山重新解释三民主义是执行三大政策的需要。易言之，如果孙中山不对三民主义作新的解释，增加鲜明的反帝内容，强调人民主权、全民政治、关心农民土地问题和支持工农运动，那么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便只能是孙中山的一厢情愿，因为联合与合作是相互的，是有条件的。从共产国际及其中国支部中国共产党一方来说，他们认定中国当前的革命性质和中心任务“是反对帝国主义者及其在中国的封建代理人的民族革命”，承认孙中山领导的中国国民党是“中国唯一重大的民族革命集团”^⑭，“比较是革命的民主派，比较是真的民主派”^⑮，因而决定支持孙中山领导的革命运动，决定中国共产党在保持自身组织与纪律的前提下，共产党员以个人资格加入国民党。但是，国民党必须进行改造，使其“成为能联合各阶层尤其是工农群众的政党”^⑯；必须“重新解释三民主义，改变三民主义的方向，使之具有反帝的内容、群众路线”^⑰。1923年11月，共产国际通过决议，建议国民党将其奉为党的基础的三民主义作如下解释，以表示“国民党是一个符合时代精神的民族政党”：

民族主义，就是国民党依靠国内广大的农民、工人、知识分子和工商业者各阶层，为反对世界帝国主义及其走卒、为争取中国独立而斗争。……

民权主义，不能当作一般“天赋人权”看待，必须看作是当前中国实行的一条革命原则。这里必须考虑到，在资产阶级社会的条件下，民权主义可能蜕变为压迫群众的制度和工具。因此，国民党在向群众灌输民权主义的原则和解释其含义时，应使其有利于中国劳动群众，即只有那些真正拥护反帝斗争纲领的分子和组织才能广泛享有这些权利和自由，而决不使那些在中国帮助外国帝国主义者或其走狗（中国

军阀)的分子和组织享有这些自由。

民生主义,如果解释为把外国工厂、企业、银行、铁路和水路交通收归国有,那它才会对群众具有革命化的意义。……至于中国的民族工业,国有化原则在现在也可适用于它,因为这将有利于进一步发展国家的生产力。……必须向缺乏土地的广大农民说明,应当把土地直接分给在这块土地上耕种的劳动者,消灭不从事耕作的大土地占有者和许多中小土地占有者的制度。……^⑧

为了推动国民党的改组和重新解释三民主义,共产国际还指示中国共产党“应当要求尽快地召开国民党代表大会。关于建立广泛的民族民主运动问题,应当是这次代表大会的中心议题。”^⑨

从孙中山和国民党方面说,对列宁领导的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上述合作建议是真诚欢迎和原则上接受的。孙中山在1921年12月第一次会见共产国际代表马林之后,“得知彼邦政党,心焉向往,联俄之议以起”^⑩。1922年8月,他会见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李大钊,表示理解共产党员只能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的合作主张,并亲自主盟介绍李大钊加入国民党,要他“尽管一方面做第三国际党员,一面加入本党帮助我”,决定改组中国国民党。1923年8月,孙中山聘请苏联代表鲍罗廷为国民党特别顾问,加速国民党改组的步伐,随即于10月委任廖仲恺、李大钊等5人为改组委员。11月发表《改组宣言》,提出按照“务求主义鲜明,政策切实而符民众所渴望”和“分子淘汰,去恶留良”等项原则,起草新的党纲党章。从国民党“一大”通过的由鲍罗廷、汪精卫、廖仲恺等人负责起草、孙中山审定的纲领性文件“宣言”和孙中山在“一大”期间和会后的言论看,上述共产国际关于重新解释三民主义的建议几乎都为孙中山所接受和采纳。据此有理由认为:孙中山重新解释三民主义是为着适应三大政策的需要,同时也为三大政策的实施提供了思想理论上的依据。

第二,三大政策是新三民主义的核心,是新三民主义在当时阶段的最重要的政策体现,决非如某些台湾学者所说,只是“三件个别的事实”^⑪。主义决定政策,政策体现主义。任何一种思想、学说、主义,只要它介入政治生活,总是要根据它对当前政治运动的性质、任务和目标等等的认识,体现为具体的政策、策略、口号和措施,以吸引和指导人们实现其近期和长远的目标。没有或缺乏政策策略的主义,会因其缺少与现实政治运动实际的直接衔接而丧失或弱化其理论指导意义,甚至流为空谈。辛亥革命前后的旧三民主义虽然缺乏明确的政策、策略方面的内容,但仍然有某些可视为政策、策略的口号和措施,如武装反清、联络会党、运动新军、建立民国、护国、护法、联合南方地方军阀以反对北洋军阀、争取列强援助等等。新三民主义是新时代的三民主义。所谓新时代,按照孙中山的解释是:“现在是拿出鲜明的反帝国主义的革命纲领来唤起民众为中国的自由、独立而奋斗的时代了。不如此,是一个无目的、无意义的革命,将永久不会成功。”^⑫这个新时代的革命任务就是对内“终要把军阀来推倒,把受压的人民完全来解放”,对外“要反抗帝国侵略主义,将世界受帝国主义所压迫的人来联络一致,共同动作,互相扶助,将全世界受压迫的人民都来解放。”^⑬因此,“打倒列强”、“铲除军阀”和“唤起民众”,成为当时最为响亮、最有号召力的口号,因为它们反映了新时代的革命性质与要求,符合新三民主义的革命精神(鲜明的反帝内容的民族主义,建立“平民专政”以反对少数人专政的民权主义,通过“节制资本”和“耕者有其田”以改善工农生计的民生主义)。而要真正唤起民众以打倒列强、铲除军阀,实现国家独立、人民自由的革命任务,

就必须实行联俄、联共和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因为，当时只有社会主义的俄国是一切被压迫民族进行反帝民族解放运动的真诚同情者和支持者，只有中国共产党制定了鲜明的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纲领并真正代表工农民众的利益，只有扶助工农运动才能唤起和动员工农大众投身国民革命运动。否则，这个革命就会如孙中山所说：“将永久不会成功”。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与新的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有着对应关系，而且密不可分，决不是“三件个别的事实”；认为经过孙中山重新解释的三民主义是“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三民主义”^⑨，乃是符合历史实际的正确论断。

注 释：

- ① 《政治周报》第3期，1925年12月20日出版；转引自鲁振祥《三大政策研究中的几个问题》，载《孙中山和他的时代》中卷，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1272—1273页。
- ②④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2)，第41、282页。
- ③⑧ 狭间直树：《关于‘三大政策’的几点考察》，载《孙中山和他的时代》，第1331、1327页。
- ⑤ 《人民周刊》第30期，1926年11月7日（人民出版社1982年影印）。
- ⑥ 参见《孙中山和他的时代》中卷，第1285页。
- ⑦ 黄彦：《关于国民党‘一大’宣言的几个问题》，见《孙中山和他的时代》中卷，第1238页。
- ⑨⑩ 《致全党同志书》，《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540、541—542页。
- ⑪ 《附：访问国际社会党招待局的谈话报导》，《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273页。
- ⑫ 《与江亢虎的谈话》，《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580页。
- ⑬ 《关于民生主义说明》，《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111—113页。
- ⑭⑮⑯⑰ 《三民主义·民生主义》，《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381、381、391、384页。
- ⑱ 《孙中山年谱长编》下册，第1510—1511页。
- ⑲ 达林：《中国回忆录》，转引自《孙中山年谱长编》下册，第1444页。
- ⑳ 《宋庆龄选集》，第465、466页。
- ㉑ 《冯自由致孙中山函稿》，上海《档案与历史》1986年第1期。
- ㉒⑳ 《孙中山年谱长编》下册，第1839、1827页。
- ㉓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关于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关系问题的决议》，《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第1辑，第76页。
- ㉔ 《中国现代史资料选编》(2)，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72页。
- ㉕ 引自《中国国民党“一大”史料专辑》，《广东史资料》第42辑，第339页。
- ㉖ 霍罗布尼奇：《鲍罗廷与中国革命》(1924—1925)，转引自《孙中山年谱长编》下册，第1564页。
- ㉗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关于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和国民党问题的决议》，《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第81—82页。
- ㉘ 见《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第80页。
- ㉙ 毛思诚等：《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转引自《孙中山年谱长编》下册，第1413页。
- ㉚ 蒋永敬：《百年老店——国民党沧桑史》，(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61页。
- ㉛ 《对于中国国民党宣言旨趣之说明》，《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126页。
- ㉜ 《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83页。